

北票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研究

王 宇

大板营子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波汰沟村大板营子村民组西侧台地上,东北距大板镇6公里。1994年秋,1999年7月、9月,共经三次发掘,其中第一次共发掘墓葬5座(94BDM1、94BDM2、94BDM3、94BDM4、94BDM10),第二、三次共发掘墓葬23座(99BDM1—99BDM23)。第一次发掘的5座墓葬中,只有94BDM2和94BDM3保存较好,共发现陶器9件,其中1件颈部残损,不能辨识器形。第二、三次发掘共出土陶器61件,除3件纺轮和残器外,可辨识器形的陶器共57件。现以这三次发掘中发表的陶器为资料,对该墓地进行初步研究。

1.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类型分析

按照器形不同,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可分为壶、罐2类。

壶 26件。均为泥质陶,套接轮修。按照器形不同,可分为2型。

A型 25件。展沿,束颈,溜肩,弧腹,平底。多数在颈部饰竖向磨光暗纹。按照整体器形,可分为2亚型:

Aa型 器形较大,腹部较深,整体瘦高,高度一般在20厘米以上。99BDM11:1,圆唇,展沿,束颈,溜肩,深弧腹,平底。颈部饰竖向磨光暗纹,其下饰刻划弦纹,弦纹间夹饰水波纹。口径13.6、腹径21.5、底径10.2、高25.5厘米(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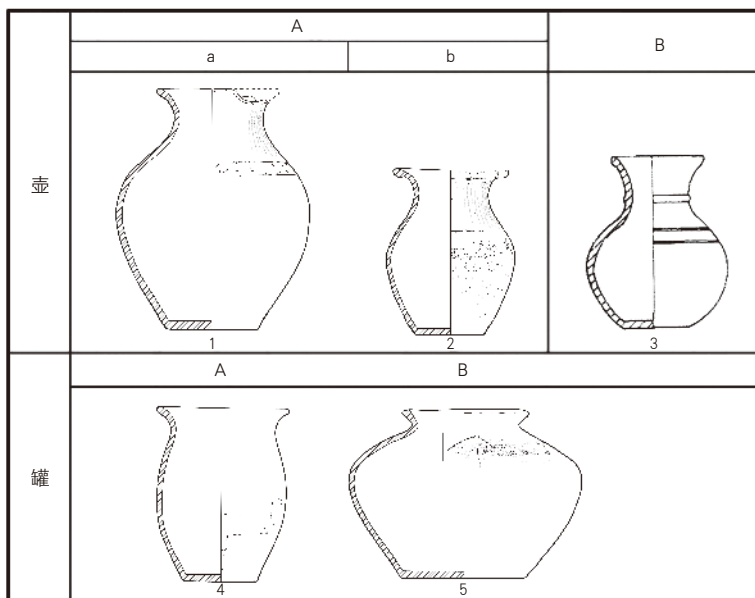
Ab型 器形较小,腹部较浅,高度一般在15厘米左右。99BDM12:3,舌状唇,展沿,束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饰竖向磨光暗纹,其下饰1周刻划弦纹,腹部饰压印席纹。口径9.8、腹径10.8、底径5.8、高15.4厘米(图一,2)。

B型 1件。94BDM1:2,侈口,束颈,溜肩,弧腹,平底。颈部有1周泥条附加堆起的凸棱,肩部饰2周刻划弦纹。口径10、底径7.6、高18.8厘米(图一,3)。

罐 37件,按照质地可分为2型。

A型 27件。夹砂陶。多为套接轮修,个别手制。侈口,束颈,弧腹,平底。多数为素面,个别在颈部饰刻划纹饰。99BDM10:4,残。灰陶。圆唇,展沿,弧腹,底部不平整。素面。口径12.3、腹径12、底径6.8、高16.2厘米(图一,4)。

B型 10件。泥质陶。口沿形制较丰富,溜肩,弧腹,平底。多数在肩部饰刻划纹,个别在颈部饰磨光暗纹、腹部饰戳印纹饰。99BDM6:7,完整。灰陶。轮制,近底部有套接痕迹。方唇,侈口,溜肩,斜腹,平底。肩部饰压印麦穗和网格相间的纹饰。肩上有3道划



图一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类型图
1. 99BDM11:1 2. 99BDM12:3 3. 94BDM1:2 4. 99BDM10:4 5. 99BDM6:7

痕。口径10.2、腹径19.7、底径9.9、高13.5厘米(图一, 5)

2.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纹饰

(1) 纹饰分类

按照施纹方式可分为4类：磨光暗纹、刻划纹、戳印纹和压印纹。

① 磨光暗纹

磨光暗纹的施纹方法是在陶器成胎后，用硬质地工具如鹅卵石等在陶器表面划出纹饰后再进炉烧造。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的磨光暗纹纹饰共4类：

A：竖向磨光暗纹，饰于器物的颈部，可分为单道竖向施纹、2道为一组竖向施纹、3道为一组竖向施纹3种，施这种磨光暗纹的大多为A型壶，少数B型罐上也有(图二, 1、2、3)。

B：网格状磨光暗纹，饰于器物的腹部，施纹器类为A型壶(图二, 4)。

C：通体磨光，磨光的方向一致，整体比较凌乱，施纹器类为A型罐。

D：局部磨光，主要施纹部位为腹部，方向有横向也有纵向，各类器形均有这种施纹方式。如99BDM20:1的A型罐腹部磨光；99BDM18:3的B型罐口沿内部有不规则磨光，肩部凹弦纹之间磨光(图二, 5、6)。

除通体磨光的暗纹之外，磨光暗纹一般与其他纹饰结合施纹，包括两种磨光暗纹结合施



图二 陶器纹饰

1. 99BDM5:2 2. 99BDM11:1 3. 99BDM18:3 4. 99BDM12:1 5. 99BDM20:1 6. 99BDM18:3
7. 99BDM13:2 8. 99BDM14:2 9. 99BDM10:3 10. 99BDM20:1 11. 99BDM2:3
12. 99BDM12:3 13. 99BDM20:3

纹,如颈部竖向磨光暗纹和腹部网格状磨光暗纹结合施纹,这种施纹方式在陶壶上最常见。

② 刻划纹

刻划纹的施纹方式是在陶器成胎后,用尖状物体刻划出纹饰形状。一般施在陶器肩部、夹砂罐的颈部,施1周或2周。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的最常见的施纹方式是刻划纹,有3种:凹弦纹、水波纹和垂幔纹。有的与其他纹饰结合,有的单独使用(图二,7、8、9)。施纹器类包含所有陶器类型。

③ 戳印纹

戳印纹的施纹方式是在陶器成胎后,用尖状物体在器表戳印出纹饰。大板营子墓地出土带有戳印纹的陶器共5件,均为篦点纹,有的是单个工具戳点,有的并列一排的工具戳点,一般施在器物的颈部或肩部(图二,10、11)。

④ 压印纹

压印纹的施纹方式有2种:

A在陶器成胎后,用模印纹饰的滚轮状工具在陶器的施纹处环状滚过,压印出纹饰。采用这种施纹方式的陶器共3件,器形有A型壶和B型罐,纹饰为“米”字纹和菱形纹相间的席纹(图二,12)。

B在陶器成胎后,用楔形工具在器表压印出纹饰,采用这种施纹方式的陶器仅1件,A型壶99BDM20:3(图二,13)。

(2) 纹饰组合(见表一)

施于A型壶的纹饰可分为3部分:颈部、肩部及腹部。颈部所施纹饰皆为竖向磨光暗纹;肩部所施纹饰有刻划纹和戳印纹2类,其中刻划纹为凹弦纹和水波纹,戳印纹为篦点纹;腹部所施纹饰有磨光暗纹和压印纹2类,其中磨光暗纹为网格纹,压印纹有席纹和楔形纹。

施于B型壶的纹饰仅1种,即在肩部饰2周的凹弦纹。

施于A型罐的纹饰可分为颈部和腹部两部分:颈部纹饰有刻划纹和戳印纹,刻划纹为凹弦纹和水波纹,戳印纹均为篦点纹;腹部纹饰为不规则的磨光暗纹。

施于B型罐的纹饰可分为颈部和肩部两部分:颈部纹饰为竖向磨光暗纹;肩部纹饰有磨光暗纹、刻划纹和压印纹3种,磨光暗纹为不规则的横向磨光,刻划纹为凹弦纹和垂幔纹,压印纹饰为席纹。

表一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纹饰表

施纹位置	A型壶	B型壶	A型罐	B型罐
颈部	竖向磨光暗纹		弦纹、水波纹、篦点纹	竖向磨光
肩部	凹弦纹、水波纹、篦点纹	凹弦纹		凹弦纹、垂幔纹、篦点纹、局部磨光
腹部	席纹、楔形纹、网格纹		不规则磨光	

3.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组合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类型较少, 组合相对单一, 最常见的陶器组合为A型壶与A型罐, 共9座墓; 其次为A型壶、A型罐及B型壶, 共5座墓; A型罐与B型罐, 2座墓; A型壶、A型罐及其他陶器组合, 1座墓; B型壶与B型罐, 1座墓; A型壶与其他陶器组合, 1座墓葬; 单一种陶器如A型壶、A型罐或者B型罐, 共7座墓(表二)。

表二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组合表

分类	陶器组合	墓葬
I	A型壶、A型罐	99BDM2、99BDM3、99BDM5、99BDM8、99BDM11、99BDM12、99BDM13、99BDM20、99BDM21
II	A型壶、A型罐、B型罐	94BDM3、99BDM6、99BDM10、99BDM15、99BDM19
III	A型罐、B型罐	99BDM14、99BDM18
IV	A型壶、A型罐、其他	99BDM7
V	B型壶、B型罐	94BDM1
VI	A型罐、其他	99BDM22
VII	A型壶	94BDM2
VIII	A型罐	99BDM1、99BDM4、99BDM9、99BDM16
IX	B型罐	94BDM4、99BDM23

4.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年代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中, Aa型壶与锦州前燕李廆墓^[1]出土陶壶形制相似; Ab型壶与内蒙古科左后旗舍根墓地2043^[2]、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的M3: 35^[3]、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壶104相似^[4]; B型壶与科左后旗新胜屯M2: 1形制相似^[5]; A型罐与北票喇嘛洞M204: 1^[6]、新胜屯M2: 5、北票房身村晋墓^[7]出土陶罐形制相同。B型壶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北玛尼吐墓群^[8]、北票仓粮窖墓^[9]、新胜屯墓地、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0]等墓葬中均有发现。

大板营子墓地陶器纹饰以磨光暗纹和压印纹饰为主要特色, 这两种纹饰都是鲜卑陶器中常见的纹饰, 年代相对较早的舍根墓地、六家子墓地出土陶器的纹饰都是以这两种为主。而年代更早的南杨家营子墓地只有戳印纹和压印纹, 而没有磨光暗纹。磨光暗纹的普遍使用出现在辽西地区, 说明大板营子墓地年代不会早于舍根墓地和六家子墓地。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以I类组合为主, 即A型壶和A型罐。现能确定的属于早期慕容鲜卑的遗存出土陶器组合即为I类组合如舍根墓地; 北票、朝阳地区十六国时期年代相对较早的遗存如北票房身村晋墓、朝阳王子坟山墓群等都以这两种器物为基本陶器组合。而从北票仓粮窖鲜卑墓之后, 随着A型罐的减少, I类组合也逐渐消失。因此I类组合流行年代当

早于或同于以上墓葬年代。

仅次于 I 类陶器组合，大板营子墓地另一组常见的陶器组合是 II 类陶器组合即 A 型壶、A 型罐与 B 型罐。B 型罐以汉式为主，在中原汉晋墓葬中多有发现，北方十六国墓葬中亦有大量出土^[11]。B 型罐的出现虽然晚于 A 型壶和 A 型罐，但却不晚于前燕时期，在墓葬中一直沿用到北燕时期如朝阳袁台子北燕墓出土了同类陶罐^[12]。因此，II 类陶器组合的年代上限晚于 I 类陶器组合，下限与 I 类陶器组合相同。

徐基先生在《关于鲜卑慕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一文中首先将这些以 I 类、II 类陶器组合为主的墓葬，定性为鲜卑慕容部遗存，得到学术界认可，并认为其年代为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13]。这些遗存中，六家子墓地年代为东汉晚期至西晋；王子坟山墓群、新胜屯墓地年代与之相比稍晚；喇嘛洞墓地的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慕容廆迁回辽西(289年)至前燕早期；房身晋墓年代被普遍认为是前燕建国前至前燕早期；李廆墓有明确纪年，墓表的纪年为“永昌三年”(应为东晋太宁二年)，即324年。因此，就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来看，该墓地年代应与以上遗存相近，为3世纪末至4世纪初。

5. 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与相关墓地出土陶器类比研究

大板营子墓地出的几类陶器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内蒙东部和辽西地区的鲜卑墓葬中比较常见。出土这几类陶器的墓葬有科左中旗六家子墓地，科左后旗舍根墓地、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墓群^[14]，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墓地^[15]，扎鲁特旗额日格吐墓群^[16]，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鲜卑墓^[17]，额尔古纳市七卡墓地^[18]，乌兰察布卓资县石家沟墓群^[19]，科左后旗新胜屯墓地，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20]，朝阳田草沟M1、M2^[21]，朝阳王子坟山墓地，北票喇嘛洞墓地，朝阳前山十六国墓^[22]，北票仓粮窖墓，锦州李廆墓等。

按照出土陶器组合和形制，以上墓葬可分为4组(图三)：

A组 扎赉诺尔墓群、拉布达林墓地、七卡墓地。这三个墓地皆位于内蒙古东部偏北，墓葬形制均为土坑墓，出土陶器、铜铁工具、马具、骨器等，扎赉诺尔墓群还出土了桦树皮器。这些墓葬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以罐、壶为主，形制与大板营墓地A型罐相近，口径远大于底径，最大腹径位置在器身中部偏上。

以上这些墓地，年代均为东汉晚期，被认为是早期鲜卑遗存，即拓跋鲜卑早期墓葬^[23]。

该组墓葬的陶器中开始出现A型罐。

B组 南杨家营子墓地、伊和乌拉鲜卑墓、舍根墓群、六家子墓地。以上墓地集中分布在通辽市及其附近，即西拉木伦河流域。该组墓葬形制除土坑墓外还有石构墓，多为单人葬，随葬马、牛肢骨。出土器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等。陶器器类包括壶、罐，其中壶多为泥质灰陶，侈口，展沿，舌状唇，形制与大板营子墓地A型壶相同。罐均为夹砂陶，与大板营子A型罐形制相近或相同。该组墓葬的陶器组合为A型壶和A型罐，即大板营子I类陶

器组合。器物施纹方式也形成以颈部、肩部、腹部为单元的形式，纹饰以戳印、压印纹为主，开始出现少量磨光暗纹。其中，南杨家营子墓地出土陶器除上述两类外还有束颈壶、杯、壶、罐的纹饰主要为戳印篦点纹，出土东汉中南期的五铢钱，被认为是拓跋鲜卑南迁的遗迹。伊和乌拉鲜卑墓出土陶器组合与辽西地区的鲜卑墓相同，被认为是与早期拓跋鲜卑有较多联系，又与东部鲜卑有一定联系的遗存^[24]。六家子墓地出土遗存类型相对比较丰富，包括金牌饰、指环等饰品，出土“三公”镜、连弧纹镜，年代为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被认为与宇文鲜卑相关。

该组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从文化性质看，均为鲜卑或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其中舍根墓群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早期慕容鲜卑遗存。

该组遗存开始出现A型壶与A型罐的陶器组合，即I类陶器组合。A型壶中以Ab型居多。罐的数量多于壶。纹饰以压印席纹、戳印纹为主，其次为磨光暗纹。

C组 新胜屯墓地，房身村M3，十二台乡M7022，仓粮窖墓，喇嘛洞M204、M336、大板营子墓地等。该组遗存分布于朝阳、北票附近的大凌河流域。出土陶器组合仍以I类陶器组合为主，即A型壶和A型罐。此外，该组出现了在颈部施凸棱的泥质壶，即大板营子墓地B型壶和与中原地区汉墓出土陶罐形制相似的泥质罐，即大板营子墓地的B型罐，同时开始出现其他类型陶器组合。该组陶器纹饰磨光暗纹增多，成为主要陶器纹饰。

新胜屯墓地墓葬共分3排，出土陶器、玉石器、铁器等。陶器共9件，器形有壶、罐2类，此外墓地采集标本有三足尊、压印奔马纹的陶片等。年代与舍根墓地、六家子墓地相近。房身村晋墓共发掘墓葬3座，均为石板墓，出土陶器、金银饰品等，其中M3出土陶器2件，其一为泥质陶壶，形制与大板营子墓地A型壶相同，一为夹砂罐，形制与大板营子墓地A型罐相同。年代为晋代。喇嘛洞墓地共发掘三燕时期墓葬416座，多数为长方形土坑墓，少数为石板墓，出土大量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骨器、玉石器等。其中陶器以壶、罐为主，部分陶器形制与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相同。年代为3世纪晚期到4世纪上半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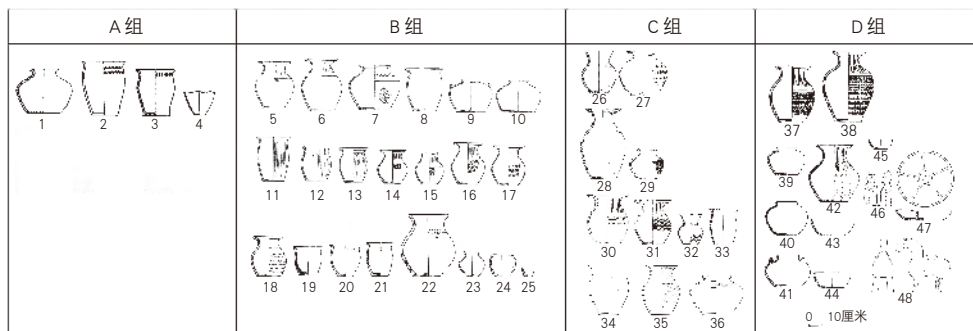
该组墓葬年代与B组相近或略晚，被认为是三燕文化遗存^[25]及与之相关的遗存，在保留鲜卑文化特征的同时，受周边文化影响，增添了新器形，形成新的陶器组合。该组遗存出现B型壶和B型罐，A型壶数量开始多于A型罐。陶器纹饰以压印席纹、磨光暗纹为主。

D组 前山十六国墓、李廆墓、田草沟晋墓。该组遗存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锦州市附近的大、小凌河流域。田草沟M1为石椁墓，前山十六国墓、李廆墓为砖室墓。该组遗存不见A型罐，出土陶器仍以A型壶为主，此外还有B型罐。另外前山十六国墓和李廆墓出土中原汉墓中常见的陶器，如俑、盒等。陶器除A型壶外皆为素面，A型壶的纹饰以磨光暗纹、压印纹、刻划纹为主，不见戳印纹。

该组墓葬中，李廆墓有明确纪年，应为324年。锦州前山墓的墓葬形制为南方地区两晋时代流行的墓葬形制，因此该组墓葬年代大致为两晋之际，与C组相近或略晚。

该组遗存的陶器组合A型罐消失，以A型壶为主，B型罐比例增加。纹饰仍以压印席纹和磨光暗纹为主，戳印纹几乎不见。

各组遗存从年代上看，A组为东汉时期，B组为东汉晚期，C组为东汉晚期到西晋，D组为两晋之际，后三组墓葬年代比较接近，且有重合，其文化面貌的差异，当为文化因素不同所致。



图三 相关遗存陶器分组图

1-4. 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 5-10. 六家子墓地出土 11-17. 舍根墓群出土 18-25. 南杨家营子
26,27. 喇嘛洞M363出土 28,29. 喇嘛洞M49出土 30-33. 新胜屯M2出土 34-36. 大板营子99M6出土
37-38. 李庞墓出土 39-48. 前山十六国墓出土

从文化内涵看，A组被认为是拓跋鲜卑的早期遗存。这组遗存中，出土的桦木弓、弓囊、骨镞、骨弓弭、骨鸣镝、铁镞等，随葬马头、羊头等，对应文献记载拓跋鲜卑“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帝纪·序纪》）的生计模式。该组遗存中可见明显的匈奴文化因素，如动物形象及双耳等。B组遗存分布于A组遗存之南，其中南杨家营子墓地和伊和乌拉鲜卑墓被认为是晚于A组的拓跋鲜卑遗存，应为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遗存。而舍根墓群为早期慕容鲜卑遗存。C组遗存为慕容鲜卑相关遗存。参考朝阳北票地区的史地沿革，慕容鲜卑初居辽西的时间为3世纪初^[26]至莫护跋迁入辽东北之前^[27]。慕容鲜卑第二次居辽西的时间为289年慕容廆迁回徒河之青山^[28]至咸康七年(341)迁都龙城^[29]。D组遗存中，有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前山十六国墓和李庞墓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东晋时期砖椁墓相似，陶器中的钵、俑、鞍马、果盒等为中原器物。其中李庞墓墓表记录墓主人为来自中原的汉族人。同为D组的朝阳田草沟M1为石椁墓，随葬牛腿骨，出土金步摇等典型慕容鲜卑器物，为这一时期慕容鲜卑的代表遗存。

从陶器组合看，四组遗存陶器发展演变为，A组出现A型罐，B组出现A型壶，并形成I类陶器组合，即A型壶与A型罐共存，且壶中以Ab型壶为主；C组出现B型壶和B型罐，A型罐数量减少，A型壶数量增多，尤其是Aa型壶数量比例提高；D组，A型罐消失，B型罐数量增多。

与大板营子墓地陶器相似的遗存其陶器组合以I类为主，其中A型罐更具备早期文化特

征，B型罐则是晚期鲜卑文化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板营子墓地是C组遗存中A型罐数量比例最高的，陶器纹饰也以兼备压印纹、戳印纹、磨光暗纹等，比C组的其他遗存更具备早期特征。因而，大板营子墓地应为自内蒙古北部南下的鲜卑文化进入大凌河流域的相对较早的一批遗存，具备过渡时期的特征。

注

- [1] 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山李鹿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 [2]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 [4]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 [5] 田立坤：《科左后旗新胜屯鲜卑墓地调查》，《文物》，1997年第11期。
-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 [7]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 [8] 钱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9] 孙国平·李智：《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
- [11]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 [12] 蔡强：《朝阳发现的北燕墓》，《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 [13] 徐基：《关于鲜卑墓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王成：《扎赉诺尔圜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 [1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6] 关丽娟·刘桂兰：《扎鲁特旗额日格吐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
- [17]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18]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9] 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2期。
- [20] 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
- [2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甜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 [22] 李宇峰：《辽阳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 [23]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孙危：《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 [24] 孙危：《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 [25] “三燕文化遗存”最早由田立坤先生提出，“三燕文化遗存是慕容鲜卑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同时也

受到匈奴、高句丽等程度不同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遗存。”（田立坤：《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采铜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

[26] 《晋书·慕容廆载记》“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始建国於棘城之北”。大棘城即今朝阳市（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27] 莫护跋东迁年代无考，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论述迁辽东北的原因是太康二年(281)叛晋兵败之故，故迁辽东北的时间应在281年左右。

[28] 《晋书·慕容廆载记》，2804页，中华书局，1974年。

[29] 《晋书·慕容皝载记》，2822页，中华书局，1974年。

北票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研究

王 宇

大板営子墓地は遼寧省北票市大板鎮波台村大板営子村民組の西側台地上にあり、大板鎮から東北に6kmの地点に位置する。1994年秋、1999年7月と9月の合計3回の発掘がおこなわれている。このうち第1次調査で合計5基の墓(94BDM1、94BDM2、94BDM3、94BDM4、94BDM10)を発掘し、第2・3次調査で合計23基の墓(99BDM1~99BDM23)を発掘した。第1次発掘の5基の墓のうち、94BDM2と94BDM3のみが比較的残存状況が良好で、計9点の土器を公表したが、このうち1点は頸部が破損しており器形を識別できない。第2・3次発掘では、全部で61点の土器が出土し、2点の土製紡錘車を除くと、器形を識別できる土器は全部で57点である。ここではこの3回の発掘であきらかとなった土器を資料として、大板営子墓地に関する基礎的な研究をおこなう。

1.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型式分類

器形の違いにもとづき、大板営子墓地で出土した土器は壺と罐の2種類に区分できる。

壺 26点。すべて泥質陶で、輪積みで成形して轆轤で形を整えている。器形の違いから2型式に分けられる。

A型 25点。口縁部は外反し、頸部はしまる。肩部は張り、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み、平底である。多くが頸部を縦方向の暗文で飾る。全体の器形から、2つの亜型式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Aa型 器形は比較的大型で、身は深く、器高は基本的に20cm以上を測る。99BDM11:1は、口縁部は外反し、端部を丸くおさめる。頸部はしまり、肩部は張り、胴部は丸みを帯びる、平底である。頸部は縦方向の暗文で飾り、その下を弦文で区切り、弦文の間を波状文で飾る。口径13.6cm、腹部最大径21.5cm、底径10.2cm、器高さ25.5cm(図一-1)。

Ab型 器形は比較的小型で、身はあまり深さがなく、器高は基本的に15cm前後である。99BDM12:3は、口縁部は外反し、端部は舌丈にやや尖り気味に丸くおさめる。頸部はしまり、肩部は張り、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み、平底である。肩部は縦方向の暗文で飾り、その下には1周の弦文をめぐらせ、胴部は莫莖目状の印文で施文する。口径9.8cm、腹部最大径10.8cm、底径5.8cm、器高15.4cm(図一-2)。

B型 1点。94BDM1:2は、口縁部が大きく開き、頸部はしまり、肩部は張り、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む。平底である。頸部には1周の粘土紐を貼りつけた突帯をめぐらせ、肩部

に2本の弦文を施文する。口径10cm、底径7.6cm、器高18.8cm（図一-3）。

罐 37点。胎土によって2型式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A型 27点。夾砂陶。多くが輪積みによって成形して轆轤で形を整えており、まれに手捻りのものがある。口縁部は外反し、頸部はしまり、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む。平底である。多くが素文で、まれに頸部に刻画文を施文する。99DBM10：4は破損資料である。灰陶。口縁部は外反し、端部は丸くおさめる。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み、底部は平坦ではない。素文。口径12.3cm、腹部最大径12cm、底径6.8cm、器高16.2cm（図一-4）。

B型 10点。泥質陶。口縁部の形はやや多様で、肩部が張り、胴部は弧状に膨らむ。平底である。多くが肩部に篋描文を施すが、まれに頸部を暗文、胴部を印文で装飾する。99DBM6：7は完形である。灰陶。轆轤を用いており、底部近くに輪積みの痕跡がみられる。口縁部は大きく開き、端部は面をもつ。肩部は張り、平底の底部から斜めに立ち上がり胴部へいたる。肩部には綾杉印と網目印文が交互になった文様を飾る。肩には3本の線刻がある。口径10.2cm、腹部最大径19.7cm、底径9.9cm、器高13.5cm（図一-5）。

2.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文様

（1）文様の分類

施文方法によって暗文、篋描文、刺突文、印文の4類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① 暗文

暗文の施文方法は土器を成形した後、例えば玉石のような硬い工具を用いて土器表面に施文したのち再び焼成する。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暗文は、全部で4類がある。

A：縦位暗文で、頸部を飾る。一条の縦位暗文、2条1組の縦位暗文、3条1組の縦位暗文の3種類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暗文を施すのは、多くはA型壺で、少数のB型罐上にも存在する。

B：格子状暗文で、胴部を飾る。A型壺に施文される。

C：土器全体をみがく。ミガキの方向は同一で、全体はやや乱れている。A型罐に施文される。

D：一部をみがく。主な施文部位は胴部で、方向は横方向も縦方向もある。各型式の土器にいずれもこの種の施文方法のものがある。例えば、99BDM20：1A型罐には胴部に、99BDM18：3 B型罐の口縁部内面には不規則なミガキがあり、肩部の弦文の間にもミガキが施されている（図二-5・6）。

土器全体をみがくものをのぞき、暗文は一般的にその他文様と組み合わせで施文される。2種類の暗文を組み合わせた施文方法もこれに含まれ、例えば頸部の縦位暗文と胴部の格子状暗文を組み合わせたものがある。このような施文方法は壺で多用される。

② 篋描文（刻画文）

刻画文の施文方法は、土器を成形した後、尖った工具を用いて文様を刻み出す。一般的に土器の肩部や夾砂罐の頸部に1周から2周をめぐる。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にもっともよくみられる施文は篋描文で、凹弦文、波状文、垂幔文の3種類がある。あるものはその他の文様と組み合わせたり、あるものは単独で使用される（図二-7・8・9）。すべての型式にこの文様が施文された器種がみられる。

③ 刺突文

刺突文の施文方法は、土器を成形した後、尖った工具で器面を突いて施文する。大板営子墓地は刺突文のある土器が計5点出土しており、これらはいずれも篋状工具による列点文である。あるものは単体の工具の刺突で、あるものは1列に並んだ工具による刺突で施されている。一般的に頸部あるいは肩部に施文する。

④ 印文

印文の施文方法には2種類ある。Aは土器を成形した後、文様が刻まれた環状の工具を用い、器面上を転がして文様を押し出してゆく。この施文方法を採用した土器は全部で3点ある。器形にA型壺とB型罐があり、「米」字文と菱形文が交互になった莫蔭目状の文様である。

Bは土器を成形した後、楔形の工具を用いて器面に文様を押し出す。この種の施文方法を採用した土器は1点で、A型壺99BDM20：3である（図二-13）。

（2）文様の組み合わせ（表1参照）

A型壺の文様は、頸部、肩部、胴部の3カ所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頸部の文様はすべて縦位暗文である。肩部は篋描文と刺突文の2種類で、このうち篋描文は弦文と波状文、刺突文は篋列点文である。胴部の文様は暗文と印文の2種類で、このうち暗文は格子状暗文で、印文は莫蔭目状の文様と楔形文である。

B型壺に施文された文様は1種類のみで、肩部に2周の弦文を飾る。

A型罐の文様は、頸部と胴部の両部位に分かれる。頸部文様には篋描文と刺突文があり、刻画文は弦文と波状文、刺突文はすべて篋列点文である。胴部文様は不規則な暗文である。

B型罐の文様は、頸部と肩部の両部位に分かれる。頸部文様は縦位暗文である。肩部文様には暗文、篋描文、印文の3種がある。暗文は不規則な横方向のミガキで、篋描文は弦文と垂幔文、印文は莫蔭目状の文様である。

表1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文様一覧

施文位置	A型壺	B型壺	A型罐	B型罐
頸部	従位暗文		弦文、波状文、 匏列点文	従位ミガキ
肩部	凹弦文、波状文、 匏列点文	凹弦文		凹弦文、垂幔文、 匏列点文、部分的な ミガキ
胴部	莫座目状の文様、 楔形文、格子状暗文		不規則なミガキ	

3.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の土器組成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型式は比較的少なく、組成も相対的に単純である。もっとも一般的な土器組成はA型壺・A型罐で、合計9基ある。その次がA型壺・A型罐・B型罐で、合計5基。A型罐・B型罐の組み合わせは2基である。A型壺・A型罐・その他の土器の組み合わせが1基、B型壺・B型罐が1基、A型壺・その他の土器の組み合わせが1基ある。1種類の土器のみが出土した墓は合計7基あり、それはA型壺、A型罐、B型罐である(表2)。

表2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組合せ

分類	土器の組合せ	墓葬
I	A型壺、A型罐	99BDM2、99BDM3、99BDM5、99BDM8、99BDM11、 99BDM12、99BDM13、99BDM20、99BDM21
II	A型壺、A型罐、B型罐	99BDM3、99BDM6、99BDM10、99BDM15、99BDM19
III	A型罐、B型罐	99BDM14、99BDM18
IV	A型壺、A型罐、その他	99BDM7
V	B型壺、B型罐	94BDM1
VI	A型罐、その他	99BDM22
VII	A型壺	94BDM2
VIII	A型罐	99BDM1、99BDM4、99BDM9、99BDM16
IX	B型罐	94BDM4、99BDM23

4.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年代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うち、Aa型壺は李庵墓⁽¹⁾で出土した壺と形が類似する。Ab型壺は科爾沁左翼後旗の内蒙古舍根墓地2043⁽²⁾、巴林左旗の南楊家営子墓地M3:35⁽³⁾、内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の六家子墓群の壺104⁽⁴⁾と類似する。B型壺は科爾沁左翼後旗の新勝屯M2:1⁽⁵⁾に類似する。A型罐は北票市の喇嘛洞M204:1⁽⁶⁾、新勝屯M2:5、房身村晋墓出土陶罐⁽⁷⁾と形が共通する。B型壺は内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の北瑪尼吐墓群⁽⁸⁾、

北票の倉糧窖墓⁽⁹⁾、新勝屯墓地、朝陽の王子墳山墓群⁽¹⁰⁾などの墓でいずれも出土している。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の文様は、暗文と印文を主な特色とする。この2種類の文様はともに鮮卑土器の中でよくみられる文様であり、年代が相対的に早い舍根墓地と六家子墓地で出土した土器の文様は、いずれもこの両文様を主とする。年代がさらに早い南楊家営子墓地には刺突文と印文のみがあり、暗文はない。遼西地区における暗文の普遍的な使用の開始は、大板営子墓地の年代を舍根墓地と六家子墓地より遡及でき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は、A型壺とA型罐からなるI類組成を主とする。現在確認できる初期慕容鮮卑の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組成は、舍根墓地がI類組成である。そして、遼寧省北票・朝陽地区にある十六国期の年代が相対的に早い遺跡の北票市房身村晋墓や朝陽王子墳山墓群等は、いずれもこの両種の土器が基本的な土器組成となる。北票市倉糧窖墓以降、A型罐の減少にともないI類組成もまた、次第に消滅する。このためI類組成が流行した年代は、以上墓葬の年代より早い時期か同時期である。

I類組成のつぎに大板営子墓地でよくみられるもう一組の土器組成は、A型壺、A型罐、B型罐を組み合わせとするII類組成である。B型罐は漢式で、中原の漢晋墓で多く発見されており、北方十六国期の墓葬中でもまた大量に出土する⁽¹¹⁾。B型罐の出現はA型壺とA型罐より遅いもの前燕期までは下らず、北燕期の袁台子北燕墓まで継続してこの種の罐が墓から出土する⁽¹²⁾。このため、II類組成の上限年代はI類組成より遅く、下限はI類組成と同じである。

徐基は「鮮卑慕容部遺存に関する初歩考察」の中で、まずこのI類とII類組成を主とする墓葬を鮮卑慕容部の遺跡と定め、学界の同意を得て、あわせてその年代を後漢後期から魏晋期にかけてとした⁽¹³⁾。これら遺跡のうち、六家子墓地の年代は後漢晩期から西晋期で、十二台磚厰墓地と新勝屯墓地の年代はこれよりやや下の時期である。喇嘛洞墓地の発掘者は、その年代を慕容廆の遼西西遷(289年)～前燕早期とし、房身村晋墓の年代は一般的に前燕建国前～前燕早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李廆墓は明確な紀年をもち、墓標の紀年は「永昌三年」(東晋太寧二年に相当)で、すなわち324年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大板営子墓地の出土土器からみて、この墓地の年代は上述の遺跡に近いはずで、3世紀末～4世紀初であろう。

5. 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と関連墓地出土土器との比較研究

大板営子墓地から出土する土器のうち、いくつかの器種は、後漢末年から西晋期の内蒙古東部と遼西地区の鮮卑墓で比較的好くみられる。このような土器が出土した墓には、内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の六家子墓地、科爾沁左翼後旗の舍根墓地、呼倫貝爾市の扎賚

諾爾墓群⁽¹⁴⁾、額爾古納市の拉布達林墓地⁽¹⁵⁾、扎魯特旗の額日格吐墓群⁽¹⁶⁾、新巴爾虎左旗の伊和烏拉鮮卑墓⁽¹⁷⁾、額爾古納市の七卡墓地⁽¹⁸⁾、烏蘭察布盟卓資県の石家溝墓群⁽¹⁹⁾、科爾沁左翼後旗の新勝屯墓地、朝陽の十二台郷磚廠88M1号墓⁽²⁰⁾、朝陽の田草溝M1・M2号墓⁽²¹⁾、朝陽の王子墳山墓地、北票の喇嘛洞墓地、朝陽の前山十六国墓⁽²²⁾、北票の倉糧窖墓、錦州の李廐墓などがある。

出土土器の組成と型式から、以上の墓を4組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図三)。

A組 扎賚諾爾墓群、拉布達林墓地、七卡墓地。この3墓地は内蒙古東部の北寄りに位置し、墓はいずれも土坑墓で、土器や青銅・鉄製工具、馬具、骨器等が出土した。このうち土器は夾砂土器を主とし、器形は罐と壺が主体を占める。器形は大板営子墓地A型罐と近く、口径は底径よりはるかに大きく、胴部最大径は胴部中位寄りにある。

上述のこれら墓地は、年代はいずれも後漢晩期で、初期鮮卑の遺跡、すなわち初期拓跋鮮卑の遺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²³⁾。

このA組遺跡の土器でA型罐が初めて出現する。

B組 南楊家営子墓地、伊和烏拉鮮卑墓、舍根墓群、六家子墓地。以上の墓地は通遼市およびその付近、すなわち西拉木倫河流域に集中的に分布する。この組の墓には土坑墓の他にさらに石築墓があり、多くは単人葬で、馬や牛の肢骨を副葬する。出土品には土器、玉石器、骨器などがある。土器の器種は壺と罐を含み、このうち壺は多くが泥質灰陶で、口縁部は大きくひらき、端部は舌状にやや尖りぎみに丸くおさめるもので、形態は大板営子墓地A型壺と共通する。このB組墓葬の土器組成はA型壺・A型罐で、すなわち大板営子I類組成である。土器の施文方法もまた、頸部、肩部、胴部を単位とするもので、文様は刺突文と印文を主とし、少量の暗文が出現し始める。このうち南楊家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には、上述した器種以外に、さらに束頸壺と杯がある。壺と罐の文様は主に刺突窠列文である。後漢中晩期の五銖銭が出土し、拓跋鮮卑の南遷した遺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伊和烏拉鮮卑墓出土土器の組成は遼西地区の鮮卑墓と同じで、初期拓跋鮮卑と比較的關係が深いと考えられており、また東部鮮卑と一定の關係がある遺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²⁴⁾。六家子墓地の出土遺物は比較的多く、金牌飾や指輪等の装飾品が出土し、「三公」鏡と連弧文のある鏡が出土し、年代は後漢晩期～西晋期で、宇文鮮卑に関連す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このB組遺跡の年代は後漢晩期～西晋期である。その性格からみて、いずれも鮮卑あるいは鮮卑と関連する遺跡であり、その中の舍根墓群は多くの研究者が初期慕容鮮卑の遺跡と認めている。

このB組遺跡でA型壺・A型罐の土器組成、すなわちI類組成が出現した。A型壺の中ではAb型が多数を占める。そして罐の数が壺より多い。文様は莫産目状の印文と刺突文を主とし、そのつぎが暗文である。

C組 新勝屯墓地、房身村3号墓、十二台磚廠M7022、倉糧窖墓、喇嘛洞M204、M336、大板営子墓地等。この組の遺跡は、朝陽と北票市付近の大凌河流域に分布する。出土土器はA型壺・A型罐のI類組成を主とする。この他に、このC組において、頸部に凸稜のある泥質壺である大板営子墓地B型壺と、中原漢墓から出土する陶罐と形が類似する泥質罐の大板営子墓地B型罐が出現し、同時にその他型式の土器を組み合わせた副葬も開始した。このC組遺跡の土器文様は暗文が増え、主要な文様となる。

新勝屯墓地の墓は3列に並ぶ配置で、土器、玉石器、鉄器等が出土した。土器は合計9点で、器形には壺と罐の2種類がある。この他に墓地で採集された資料には、三足尊や疾走する馬を印文文様とする奔馬印文土器片等がある。年代は舎根墓地や六家子墓地と近い。房身村晋墓では合計3基の墓を発掘した。いずれも板石墓で、土器や金銀製装飾品等が出土した。このうち3号墓で出土した土器は2点で、うち1点は泥質壺で、形態が大板営子墓地A型壺と共通する。もう1点は夾砂罐で、形態が大板営子墓地A型罐と共通する。年代は晋代である。喇嘛洞墓地では全部で三燕期の墓葬416基を発掘した。多くは長方形土坑墓で、少数が石板墓である。大量の土器、青銅器、鉄器、金銀器、骨器、玉石器等が出土した。このうち土器は壺と罐を主とし、一部の土器の形態が大板営子墓地出土土器と共通する。年代は3世紀末～4世紀前半である。

このC組墓葬の年代はB組に近いあるいはやや遅く、三燕文化の遺跡⁽²⁵⁾およびそれと関連する遺跡と考えられており、鮮卑文化の特徴をとどめると同時に周辺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て新たな器形が加わり、新たな土器組成を形成している。

このC組遺跡でB型壺とB型罐が出現し、A型壺の数がA型罐より多くなり始める。土器の文様は莫蔭目状の印文と暗文が主体を占める。

D組 前山十六国墓、李廆墓、田草溝晋墓。この組の遺跡は遼寧省朝陽市と錦州市付近の大・小凌河流域にある。田草溝1号墓は石槨墓で、前山十六国墓と李廆墓は磚室墓である。このD組遺跡ではA型罐がみられず、出土土器はA型壺が主で、この他にさらにB型罐がある。この他に、前山十六国墓と李廆墓では中原漢墓でよくみられる俑や盒などの土器類が出土した。土器はA型壺以外はすべて素文である。A型壺の文様は暗文と印文、篋描文を主とし、刺突文はみられない。

このD組墓葬のうち、李廆墓は明確な紀年を持ち、324年である。前山十六国墓の墓構造は南方地区両晋期に流行した構造である。よって、このD組墓葬の年代はおよそ両晋交代期で、C組に近いあるいはやや後出する。

このD組遺跡の土器組成では、A型罐が消失し、A型壺が主となり、B型罐の比率が高まる。文様は莫蔭目状の印文と暗文が主で、刺突文はほぼみられないようだ。

各組の遺跡を年代からみると、A組は後漢期、B組は後漢晩期、C組は後漢晩期～西晋、

D組は兩晋交代期である。後者3組の墓葬の年代は比較的近接しかつ重なり合い、その文化様相の違いはまさに文化要素の相違と一致する。

文化内容からみて、A組は拓跋鮮卑の初期の遺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このA組遺跡では、白樺製の弓、弓筒、骨鏃、骨製弓弭、骨製鳴鏑、鉄鏃等が出土し、馬頭や羊頭などを副葬し、文献に記載された拓跋鮮卑の「畜牧遷徙し、射獵を業と為す」(『魏書』卷1序紀)という生業方式に対応する。このA組の遺跡中には、動物図像や双耳鏡など、あきらかに匈奴文化の要素がみられる。B組遺跡はA組遺跡の南に分布し、このうち南楊家営子墓地と伊和烏拉鮮卑墓はA組の拓跋鮮卑遺跡より後出する時期と考えられ、拓跋鮮卑の南遷過程中の遺跡である。そして舎根墓群は初期慕容鮮卑の遺跡である。C組遺跡は慕容鮮卑の遺跡である。朝陽・北票地区の歴史沿革を参考にすると、慕容鮮卑が初めて遼西に居住した年代は、3世紀初め⁽²⁶⁾から莫護跋の時期に遼東の北に移動⁽²⁷⁾する前までである。慕容鮮卑の第2次遼西居住期は、289年に慕容廆が徒河の青山に移動⁽²⁸⁾してから咸康七年(341年)の龍城遷都⁽²⁹⁾までである。D組遺跡中にはあきらかに漢文化の要素があり、前山十六国墓と李廆墓の墓構造は中原地区東晋期の磚槨墓に類似し、土器中の鉢、甗、鞍馬甗、果盒等は中原のものである。このうち李廆墓では墓標が出土し、墓主人は中原から来た漢人であると記録する。同じくD組の田草溝M1は石槨墓で、牛の大腿骨を副葬し、金製歩揺など典型的な慕容鮮卑の遺物が出土し、この時期の慕容鮮卑の代表的な遺跡である。

土器の組み合わせからみて、4組の遺跡における土器の変遷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A組でA型罐が出現する。B組でA型壺が出現し、あわせてA型壺とA型罐のI類組成が形成された。かつ壺の中ではAb型壺が主体となる。C組でB型壺とB型罐が出現する。A型罐の数が減少してA型壺の数が増加し、とりわけAa型壺の比率が高まる。D組でA型罐は消失し、B型罐の数量が増加する。

大板営子墓地の土器と類似する遺跡は、その土器組成はI類組成を主とする。このうちA型罐はより一層早い時期の文化的特徴をそなえている。そしてB型罐は、後期鮮卑文化が漢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た産物である。大板営子墓地はC組遺跡の中でA型罐の数量比率がもっとも高い遺跡で、土器文様もまた印文、刺突文、暗文等が揃い、C組のその他遺跡に比べてより一層早い時期の特徴をそなえている。したがって、大板営子墓地は内モンゴル古北部から南下した鮮卑文化が大凌河流域に入った比較的早い時期の遺跡であり、過渡期の特徴をそなえている。

註

- (1) 辛癸・魯宝林・吳鵬「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簡報」『文物』1995年第6期。
- (2) 張柏忠「哲里木盟發現的鮮卑遺存」『文物』1981年第2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営子の遺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

- 第1期。
- (4) 同註(2)。
張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鮮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 (5) 田立坤「科左後旗新勝屯鮮卑墓地調査」『文物』1997年第11期。
- (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北票市文物管理所「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
- (7) 陳大為「遼寧北票房身村晉墓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
- (8) 錢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瑪尼吐鮮卑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 (9) 孫国平・李智「遼寧北票倉糧窖鮮卑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 (1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王子墳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97年第11期。
- (11) 張小舟「北方地区魏晉十六国墓葬的分区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
- (12) 蔡強「朝陽發現的北燕墓」『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 (13) 徐基「關於鮮卑慕容部遺存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年会第六次年会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賚諾爾古墓群1986年清理發掘報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王成「扎賚諾爾圈河古墓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 (1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局・額爾古納右旗文物管理局「額爾古納右旗拉布達林鮮卑墓群發掘簡報」『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 (16) 閔麗娟・劉桂蘭「扎魯特旗額日格吐鮮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
- (17) 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新巴爾虎左旗伊和烏拉鮮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輯、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 (18) 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局・額爾古納右旗文物管理局：「額爾古納右旗七卡鮮卑墓清理簡報」『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 (19) 内蒙古博物館「卓資県石家溝墓群出土資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 (2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十二台鄉磚廠88M1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11期。
- (2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県文物管理所「遼寧朝陽甜草溝晉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 (22) 李宇峰「遼寧朝陽發現十六国時期後燕崔遜墓碑」『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 (23) 宿白「東北、内蒙古地区的鮮卑遺迹－鮮卑遺迹輯録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孫危「内蒙古地区鮮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 (24) 同註(23)、孫危2001年。
- (25) 「三燕文化の遺跡」は田立坤によって最初に示された。「三燕文化の遺跡は慕容鮮卑が漢文化の強烈な影響下で、同時に匈奴、高句麗等からのまた別の影響も受けて形成された一種の独特な特色を持つ文化遺跡である。」(田立坤「朝陽發現的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采銅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6) 『晋書』卷108慕容廆載記「曾祖莫護跋、魏初其の諸部を率いて遼西に入居し・始め国を棘城之北に建てる」。大棘城はすなわち現在の朝陽市である(田立坤「棘城新考」『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
- (27) 莫護跋の東遷年代には論考がないが、馬長寿は『烏桓與鮮卑』で遼東の北に移動した原因は太康二年(281)に晋に叛いて敗れたためと論述する。ゆえに遼東の北に移動した時期は281年頃とみている。

王 宇

- (28) 『晋書』 卷108慕容廆載記 (『晋書』 2804頁、中華書局、1974年)
- (29) 『晋書』 卷108慕容皝載記 (『晋書』 2822頁、中華書局、1974年)